

结成“亲戚”不翻脸，“社亲”文化传千年

在豫北焦作一带，有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当地一些居民非亲非故，却从唐代开始，以村（社）为单位结为社亲，彼此留下了“永不翻脸”的誓约。

各村之间，从结亲的那一刻起，就以“走亲戚”的方式表达着各自的情感。然而，令人惊叹的是，一直到千年的今天，这种“亲戚”依然在走，好像永无停息。

在新时代，古老“社亲文化”融入党建、扶贫、致富、文明等新内涵，对于加强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一体推进等意义重大。

▶象征桑坡村和柳湾村社亲深情的“金兰友谊碑”。
受访者供图



相距不远，互相之间都是社亲，历经上千年之久。村里老人讲，代代传下来的结亲缘由是有共同的崇拜——“圣母”。至今，每逢“圣母”生日那天，五个村的人都要共同祭祀，共同庆贺。

沁阳西万镇的景明村和义庄村，则是由于共同供奉“二仙奶奶”（即魏华存，道教上清派第一代宗师，又称紫虚元君，民间称之为“二仙奶奶”）而结成的社亲。并且，因景明村人擅长编织，经常路过义庄上山砍荆条，使得两村交往更加密切。

一个普遍的规律就是，汉族村之间的社亲，由于是缘于共同的信仰而结社，出于对神的敬畏，社亲成员之间都严肃认真，互不开玩笑。

而回族村与汉族村的社亲，应该是最初受到汉族村所结社亲的影响，在回、汉民族长期交流交往交融的基础上嫁接过来的，与信仰无关。

千百年来，彼此双方都坚守祖先留传下来的“永不翻脸”的规矩，无论发生什么误会，只要知道了社亲关系，都会在玩笑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回汉之间的社亲，往往是一个回族村与周边多个汉族村结为社亲，呈辐射状。比如博爱县回族村大新庄就是这样。据村民闪君智讲，位于黄河的二级支流丹河以东的大新庄与丹河以西的万善、密窑、景明、龙泉、邵部、校尉营等汉族村都是社亲，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交织，见面逗得厉害，但又亲如一家人。

最久远的社亲已历经千年

在回汉社亲中，有一种特殊类型：就是历史上在一方遇到困难时，另一方仗义相助，因感恩而结成的社亲。

博爱大新庄与沁阳邢邵村，就属于感恩类型。

相传，大新庄与邢邵的结亲，源于一场奇案。在明朝正德年间，大新庄的闪耀宗等一行数人从山西买羊回来，在过税卡时，由于税差征税过重，双方发生争执。在争执的过程中，一税官突然倒地，不幸身亡。闪耀宗等人被告到山西省陵川县衙。时任县令的陈我捷升堂断案，从多次审讯及各方口供来看，此案疑点颇多，特别是数次验尸，均未发现死者身上有打斗痕迹，推断应是因病猝死，与嫌犯无关。陈县令本想当庭释放闪耀宗等人，但念及其他税官感受，思量再三，遂将被告闪氏等人判决发配充军。

光看充军路线，很是吓人，犯人几无活路：“从陵川县城出发，经过狼拉车、黑石岭、鬼捣碓、水磨湾、小鬼坡、黄沙阵、古邗坡、红道庙等地，押送至麦康县。”

几经磨难，身披枷锁的闪氏等人被衙差押送至太行山南麓的怀庆府一带，开锁释放。令他们惊喜万分的是，发配路线虽然听着很吓人，然而一路却有惊无险，目的地居然还是他们的家乡，等于将他们押送回家无罪释放了。后来他们得知，县令陈我捷居然是相隔十几里的邢邵村人，原来是陈县令老乡施巧救了他们。

受此大恩，出于感激，两村就此结为社亲。“邢新社亲”历经500多年经久不衰。

采访中，听邢邵村的陈家后人讲，当年那个充满智慧的县令陈我捷的墓至今仍在，这倒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在村干部陈光芒和陈我捷第22代孙陈文中等人的带领下，我们驱车来到了位于邢邵村以北10多里地、神农山南麓的虎头山脚下。一个并不太显眼的黄土堆，以及一块已经断裂的石碑，见证了500多年前那段流传至今的奇案。

然而，就案而论，从县令陈我捷所判闪氏等充军路线来看，好像带有许多文学加工成分。对此，笔者于2019年冬两次赴山西的泽州和陵川进行实地考察，其结果令人惊叹：这些地名都位于晋古道上，都真实存在！

笔者调查发现，焦作的社亲历史都十分悠久。其结亲时间，一般都在唐代和明代之间。比如博爱县的薛村、坞庄、唐村、耿村、南石洞之间的社亲。

今天在博爱县孝敬乡的薛村村委会旁边，仍建有一座天仙圣母庙。此庙最早建于唐朝初年，后多次重建。在庙内的《重修天仙圣母庙碑记》有如下记载：“天仙圣母庙在薛家村东西两社之中，自明朝万历四十七年重修……为坞（庄）、唐（村）、耿（村）、薛（村）、南石洞所共奉，故五村之人至今称社亲焉。”该碑记载了上述五村间的社亲史实，甚为珍贵。

“如果按照唐初几个村共同建庙时推算，我们的社亲历史已过千年。”薛村的非遗老人介绍说。

团结互助是社亲的根本

“结社亲活动是焦作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互相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和纽带，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现实需要。如何发挥社亲的积极作用，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以及基层治理方面持续发力，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焦作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刘涛说。

孟州市桑坡村的回族群众有经济头脑，善于经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早早就富裕了起来。在帮助社亲共同致富方面，他们率先垂范。

1975年，桑坡村建议老社亲的柳湾村开办面粉厂，使两村共同致富。但因缺乏资金，柳湾人连购买设备的钱都凑不齐。桑坡人

得知后，不仅卖来了面粉加工设备，还带来了技术人员帮助安装调试生产。1995年，柳湾村修建学校，桑坡人听说后送来十万元，支持柳湾村发展教育。

1999年，柳湾人为增进两村之间的友谊，在村东头立起了“金兰友谊碑”，以示纪念。2007年，经两村共同商议，在柳湾再次立起了新的“金兰友谊碑”，将两村友谊世代传承。

今年初疫情期间，桑坡村连垃圾都运不出去。因为自己村没有地方倒垃圾，一直以来都是靠租邻村的地方。恰逢疫情封村，人家不让倒了。仅仅一周时间，全村大街小巷的垃圾就堆积如山，臭气熏天。这可愁坏了村两委干部。

危急时刻，村支部书记卢凤海又想起了老社亲。一个电话过去，柳湾的答复就两个字：“同意！”桑坡人赶紧派车将垃圾卸到了对方指定的地点。但后来他们才知道，垃圾只是临时卸到了一个厂子里，后来柳湾村又自己租车把垃圾运到了处理厂。

采访时，柳湾村支部书记杨中海说：“疫情无情人有情，总不能看着老社亲有困难而袖手旁观吧。”

说起疫情期间的互帮互助，不得不提起沁阳市西万村与博爱县许良村两社亲之间的故事。

许良村是一个8000多口人的回汉杂居村，西万是一个汉族大村，有12000多口人。

今年年初，新冠疫情肆虐，令人措手不及，一时间口罩成了紧缺物资，买不到口罩，大家心急如焚。危难之际，西万的老社亲把自己千方百计买来的口罩给许良送来了两万只，解决燃眉之急。

1991年，许良村中心大街急需硬化路面，但村里缺少资金。而西万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当知道情况后，村委会主动拿出五六万元为许良修了一里多长的马路。

“这笔钱在当时绝对是笔巨款啊，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才一百多块钱！”许良村支部书记闫春霞说。

2012年，西万村为表达对许良社亲的情意，将村里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许良街”；而许良村也有一条大街，村里命名为“西万街”。

“社亲”引申为“九亲”，助力基层治理

“虽然历经千年，但不论社会环境如何变化，焦作社亲这一古老习俗都在一如既往地传承和延续。今天，探究社亲的起源和发展，对于总结中原地区民族团结经验、创新民族交流形式，以及加强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一体推进等意义重大。”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说。

博爱县的大新庄村和沁阳的西万、景明村都是社亲。早在革命年代，这些社亲之间还演绎了可歌可泣的感人篇章。

1937年，西万村的中共党员田时风，就利用社亲的特殊关系，派他家是景明村的舅舅到大新庄做统战工作，号召广大的回族群众共同抗日。大新庄回族群众买存仁在田时风的领导下，成功打入日伪组织，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为太行山上八路军提供粮食、布匹、医药和枪支弹药。1944年，买存仁被叛徒出卖而英勇牺牲。大新庄的回族群众在党组织的引领下，纷纷要求入党，并成立了回民支队，英勇作战，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至抗美援朝结束，大新庄的回族烈士有37位，中共地下党员田时风所在的西万村有烈士76位；一个回族村、一个汉族村的两社亲，光革命烈士就多达113位。为弘扬红色革命精神，西万村于2014年在九凤山为76位革命烈士修建了烈士陵园，竖起了纪念碑。

为突出党建引领作用，大新庄与西万社亲在党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签订了支部联建协议；并借助社亲平台，建立了支部联建制度，确定了黄下放和陈光芒为两支部的联络员，定期对两村的党建、民生、扶贫、乡村振兴及基层治理等进行研究，在党组织领导下的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正在逐渐成熟。

大新庄借鉴和沁阳市邢邵村的社亲相处经验，分别与周边的62个汉族村及联系单位签订了《民族团结进步友好协议》，进一步拓宽了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内容包括加强民族团结、开展法制教育、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着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等十项内容。以前大新庄与邻村九府庄的关系不好，导致大新庄连一条出村的路都没有，两村自结为友好村之后，主动协商，互调土地，一条崭新的“团结路”把两村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随着不断被赋予新内涵，古老的“社亲”充满新的生机与活力，逐渐引申为三个层面的“九亲”：一是组织层面的支部亲、党员亲、群众亲；二是物质层面的产业亲、就业亲、民生亲；三是精神层面的文化亲、文艺亲和乡风文明亲。

“社亲”新内涵：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携手同行

博爱县磨头镇回族聚居村2600多人的二仙庙村与800多户的闪沟村，只有一路之隔，两村与其邻村的南十字村同是签订了回汉友好协议村。南十字村是个汉族村，共有人口800多人，是省级贫困村。

2019年，磨头镇作为扶贫项目，与孝敬镇万强蔬菜种植合作社合作，帮助南十字村建立大棚蔬菜产业园，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带动周边村民、特别是贫困户通过发展蔬菜产业提高收入，脱贫致富。

今年开春以来，南十字村的大棚蔬菜喜获丰收，但由于受疫情影响，蔬菜运不出去，销路出现问题。新鲜蔬菜保质期短，一旦积压，将很快发生变质霉烂，给贫困户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二仙庙和闪沟村得知情况后，在两村党支部的号召下，村民们积极开展消费扶贫，踊跃购买友好村南十字村的新鲜蔬菜：自家吃不完，还装上礼品袋送给周边的亲友。今年3月份以来，二仙庙和闪沟两村共购买豆角、茄子等大棚蔬菜6000多斤，价值18000多元，解决了贫困户的燃眉之急。

帮助贫困乡亲走出贫困、振兴乡村，极大丰富发展了“社亲文化”的新时代内涵。邢邵村和大新庄每年都要从对方村分别选出20户贫困户进行慰问，给贫困户送去米、面、油和救助金，尤其是对身体不便、年老体弱的老人和大病致贫的家庭，实行长期包户。修武县王屯乡西黄村九组的赵小争是个残疾人，上有老下有小，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少数民族企业伊赛公司的帮助下，他以“无本”承包了养牛厂的牛棚，一年有5万多元的固定收入。

据焦作市民宗教事务局局长高霞介绍：截至目前，焦作全市42个回族聚居村（街）已经与周边406个汉族村庄及企业联系单位，在双方党支部的主持下签订了友好协议书，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方面，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

“我们要深入挖掘焦作‘社亲现象’新的时代价值，进一步赋予这一古老传统新的生命，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融入党建、扶贫、致富、文明等新的内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回族等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说。

单地
域外

桂涛

我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二手集市上遇到一个精致的小铜秤。

它高不过一掌，三足立地，一组灵活的铜杠杆上顶着一个小秤盘，杠杆另一头是一个包铜的铅秤砣，连着四分之一圆形铁环，铁环上标有刻度。我按住秤盘，最下面固定的指针便指向刻度，标示出重量。小秤没有附加的秤砣，最大只能称四盎司的重量。

摊主说，这样有近百年历史了，因为铅秤砣外的包铜掉了一块，看我喜欢，便宜卖了给我。

这样造型的秤我是第一次见。它既非天平，也不是弹簧秤，算是英国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四盎司的秤能称什么？我本以为它是用来称黄金或是火药的，但其实是当地邮局用来称邮件的。

其实在邮政上，北爱尔兰和中国倒是颇有缘分，中国街头邮筒是绿色而非伦敦街头的红色，就和晚清时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官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北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有关。据说当年赫德反对英国在北爱尔兰的统治，特意将中国的邮筒颜色定为代表爱尔兰凯尔特文化的绿色而非代表英国的红色。我将这铜秤视为北爱尔兰在赫德之后和中国的又一段缘分。

铜秤虽小，摆在那里却昂首挺胸，透着股骄傲。当年贝尔法斯特的邮局来了邮件，要付多少邮费，全由它说了算；那些个纸短情长、家书万金，寄出前都得先交给它掂量掂量。

我对秤从小有一种亲近。小时候外婆在国营菜场工作，她负责的柜台前就有一个大台秤，酱菜、白糖、南货都从上面过。我记得那是一只绿色的大秤，有大大小小的黑色铁砝码和亮白的游码。大人越是不许我乱动，我就越觉得那秤神秘、好玩，越要自己称一称。

那个台秤是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外婆家里还有一把更古老的长杆秤，似乎是更早前的。它总是斜挂在门后，那钢钩、铁砣还有秤杆上银色的秤星，在儿时的眼里，总是那么神奇，总想拿下来玩。可大人警告我，那秤小孩子用不好，秤杆一歪，就会被秤砣砸了脚。

我后来发现，用杆秤确实需要技巧。要弄明白秤上的两个系统到底要提哪个，然后要确保秤盘上放着东西，还要防止那东西因为重量不够，导致秤砣从秤杆另一头滑落。开始称重的时候，要用手抓着秤砣和砣上的绳，慢慢在秤杆上移动，直到确保秤杆大致平衡，才能松手，放心去看秤上的秤星。

中国人有使用杆秤的传统。如今在国内的古玩市场上，还能经常看到各式各样的老杆秤。我见过最长的杆秤有小臂粗，像一根齐眉棍。只可惜这样的大杆秤因为材质多是花梨木，现在很多被人用来自成珠子，做成市场热捧的手串；小的是一种被称为“戥子”的杆秤，据说宋代就有了。戥子多装在木盒里，常用来称量金、银、贵重药品和香料，最小的戥子只有十几厘米长。

西方也曾使用过杆秤，在一些博物馆里，还能看到类似戥子的不等臂平衡称，利用杠杆原理来称重。但使用时间更长、适用范围更广的是天平和弹簧秤。

比如古埃及壁画中，死神阿努比斯用来“羽毛称心”、辨别人心善恶的是天平；古罗马神话中蒙眼仗剑的正义女神朱斯提亚手持的也是天平，象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威尼斯商人》中，唯利是图的夏洛克带去称那一磅肉的也是天平；满天星斗中，黄道十二宫里的天秤座也是天平。

而由英格兰人理查德·萨尔特在18世纪发明的弹簧秤让工业革命中的英国人用上了廉价的称量工具。比起之前使用的不等臂平衡称，弹簧秤更方便携带，也更不易做手脚，便利了生活，促进了商贸。我觉得可以放在口袋里的弹簧秤问世，堪称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后的又一大事件。

中国人在秤杆之外是否使用过天平？我查了资料，长沙的楚墓中就曾出土过等臂天平与砝码。但比起西方人，中国人显然对杆秤更有感情。一说到中国秤，大家想到的还是那黑杆银花的木杆秤：婴儿“抓周”抓的是尺刀剪、升斗戥子，求的是孩子未来经商发财；立夏“称人”用的是巨大的木杆秤，求的是身体健康；洞房花烛，用杆秤来挑新娘的盖头，求的是称心如意。

为什么中国人更爱用杆秤呢？我想不仅是因为它价格低廉、容易携带，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的中国式聪明智慧。

天平的原理是所称之物与砝码等重，大大小小一套砝码轮流上阵，过程是棋逢对手、旗鼓相当，结果是你胜我败、你死我活，更符合西方竞争对抗、强者生存的理念。

杆秤则只需要一枚秤砣，以四两之力拨动秤砣，便可称千斤重物、权衡度量，更体现出东方推崇的以柔克刚的智慧。

天平称重是冷冰冰的器具裁决，人将所称之物与砝码放定离手，结果完全交给那横梁两臂和钢铁指针决定，不偏不倚，铁面无私。

杆秤则不仅要依靠器物，还需要人的深度参与，需要人与器的密切配合，持秤者要眼到、手到、心到，最终结果不仅是看那秤杆是扬是抑，更重要看人心是否公正，心中之秤是否公道。

与天平相比，使用杆秤时更易做手脚，因此以前摊贩称东西，都要吆喝一句“放心，高高的”，手也要张开，只留两根手指提着秤杆上的系绳，向买主证明清白。

不仅如此，杆秤的发明者还别出心裁，用道德对使用者进行约束。据说杆秤上的秤星必须是代表公平正直的白色，而不是黑色，十六颗秤星取南十六星和北斗七星，再加上福、禄、寿三星之意，缺斤短两则失福、去禄、折寿，多给几两则多福、得禄、增寿。仰瞻天上炳朗日星，俯仰心中道德法则，天地之间自有大秤。

秤虽小，称的却是人心，不仅求秤上平衡，更是求心上平衡。西方持秤者是可以锱铢必较的商人，而东方持秤者还要是淳朴无私的圣人。